

IPE 在中国的发展与现状评估^{*}

李 巍◎

【内容提要】 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是与其母学科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走上了学科发展的正式轨道，逐渐出现了两代学者。第一代学者在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引进和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上作出了重要的奠基性贡献，这使得第二代学者从一开始就接受了相对系统的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专业训练，并逐渐成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新兴力量，他们体现出偏重具体议题而非宏观范式的研究特点。但与国际安全研究相比，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存在研究队伍较弱、研究水平滞后、研究议题失衡等诸多不足，这与中国在 21 世纪头十年大规模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的现实情况很不相符。本文试图为希望了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现状的中外人士提供一个详尽的路线图，并尝试为该分支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进步提出一些初步的学术建议。

【关键词】 国际政治经济学（IPE） 分支学科 阶段史 实证研究

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作为政治行为体的国家（state）一直在以“有形之手”影响着生产要素

^{*} 本研究得到中国人民大学 2012 年度新教师启动基金项目“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探索与争鸣”（项目编号：2011030299）的资助。唐世平、王勇、田野、郎平、徐进、邝艳湘、白云真、钟飞腾、左希迎以及《国际政治科学》约请的两位匿名评审人阅读了本文初稿，并提出了大量中肯的批评。不过，文中的谬误一律由本人负责。

《国际政治科学》2012/1（总第 29 期），第 138—175 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的跨国流动。政治力量在不完美的国际市场上始终无处不在，这导致了经济学对于很多国际经济现象存在解释上的贫困；另一方面，国际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受制于对经济福利的考虑，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市场带来的效率，正在改变传统安全关系的性质，并带来了大量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这两方面的原因共同为作为交叉学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的兴起提供了契机。

过去 30 年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学主要以安全研究为核心，并取得了重大进展。尽管中国有着丰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但 IPE 在中国被视为国际关系学下与国际安全研究相对应的分支学科，却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并在 21 世纪头十年才逐渐走上学科发展的正式轨道。因此，IPE 在中国兴起的一个总体宏观背景就是，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通过自主的政策选择更加深度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并在 21 世纪初加速实现经济崛起。这与美国 IPE 兴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经济地位衰落、国际挑战空前加剧的时代背景正好相反。

本文将主要评析 21 世纪头十年 IPE 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总结已有的学术成果，归纳其特点和存在的不足，以试图为今后中国 IPE 的发展提供一些启示。^① 本文认为，这十年是中国 IPE 学科建设的初级阶段，具体表现在西方 IPE 的基本研究范式 and 主要理论成果得到较为全面的引进和介绍，IPE 的研究议程和学科界限得到初步明确，IPE 的学术团队缓慢形成并逐渐壮大，实证方法在 IPE 研究中成为学术主流，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跨国投资以及能源、环境和发展等议题领域，中国 IPE 学者也诞生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

但是，作为一个新兴的分支和交叉学科，IPE 在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艰难地生存在经济学和国际安全研究的夹缝之中，缺乏学科上的知识积累。

^① 尽管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界定已经越来越清晰，但其学科交叉的性质仍存在大量的模糊地带。本文所指的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国际关系学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有少量经济学界的学者，他们要么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有着丰富的学术联系，要么也发表了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作品，故也在本文的讨论之列。

这种先天不足使中国的 IPE 研究无论在规模还是质量上,都与西方同行存在较大的差距。过去的十年是中国全面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十年,也是中国加速实现经济崛起的十年,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亟须回答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但中国 IPE 研究的学术现状难以满足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中国 IPE 学者因此还肩负着十分沉重的学术使命。

一、中国 IPE 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引进

所谓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对国际层次上的政府与市场、权力与财富关系的研究。由于中国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传统,强调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相互影响,并对其进行综合研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学术历史。^①但是,真正统一使用“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学术概念,将其当做国际关系学下的一个分支学科,并且开始实现与西方主流 IPE 知识谱系的对接,却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事情,直到 21 世纪初才初步兴盛起来,比西方晚了整整 20 年。从这个意义上说,IPE 在中国的学术发展史上还十分年轻。

(一) 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

在中国,最早致力于 IPE 的学科建设并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主要是宋新宁、王正毅和樊勇明。1991 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召开了“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时还比较年轻的宋新宁在会上提交了题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挑战·困境·出路》的学术论文,作为中国学者首次对 IPE 的学科概念进行了全

^① 在很大程度上,过去一直在中国高校被当做马克思主义通选课的“世界经济与政治”可以被视为中国早期独具特色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钟飞腾在与笔者的通信中就认为,应该将世界经济学科的建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设立作为中国 IPE 学科发展的起点,因此中国 IPE 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

面界定，对中国的相关研究议程进行了全面布局。^①

此后，IPE 的教学与研究逐渐在中国主要高校的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学的相关系所开枝散叶。^② 1999 年，宋新宁和陈岳共同完成了中国第一本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③ 不过该书致力于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强调突出中国特色，从而与西方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拉开了距离。

由于学科基础薄弱，无论是在相对成熟的国际安全领域，还是在相对落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总是与西方理论范式的引进相伴而生。在中国 IPE 发展的早期，就已经有中国学者开始了对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已有成果进行介绍，比如任东来最早对美国 IPE 中影响很大的霸权稳定论进行了评论；^④ 李滨等较早地依据吉尔平的分类，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流派的理论来源和新近的一些发展特点进行了论述，^⑤ 不仅如此，他还专门介绍了英国学派的 IPE 代表人物苏珊·斯特兰奇的结构主义思想；^⑥ 王正毅不仅全面评介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沃尔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还创造性地运用了该理论来解释东南亚和中国的发展。^⑦ 此外，作为中国引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位先驱，王逸舟

① 宋新宁 《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挑战·困境·出路》，载袁明主编 《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重庆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43—368 页。该次会议还邀请了美国 IPE 研究的领袖性学者罗伯特·吉尔平与会，介绍了当时西方 IPE 研究的最新发展趋势。参见罗伯特·吉尔平 《经济区域主义的挑战》，载袁明主编 《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第 280—318 页。

② 对于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学科发展历程，可以参见王正毅、张岩贵：《国际政治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前言，第 11—13 页。

③ 宋新宁、陈岳 《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宋新宁还详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意义，参见宋新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教学与研究》2000 年第 6 期，第 30—36 页。

④ 任东来 《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霸权稳定论》，《战略与管理》1995 年第 6 期，第 15—22 页。

⑤ 李滨、姚鸿 《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和当代代表》，《欧洲》1999 年第 5 期，第 3—13 页。

⑥ 李滨 《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 年第 3 期，第 19—23 页。

⑦ 王正毅 《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王正毅 《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和倪世雄也较早地将国际政治经济学当做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大厦的一个构成部分而引入中国，并对其在中国的传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①

但总体而言，中国的 IPE 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还只是一种零敲碎打式的前进，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学科框架、科研队伍以及人才培养体系，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的地位也没有奠定。这种局面的改变是从进入 21 世纪开始的，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就是两部风格迥异、流传甚广的 IPE 教科书诞生在中国一南一北两个研究和教学的重镇。如果说 IPE 存在两个学术源头，一个是 20 世纪 70 年代国际关系学理论围绕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所展开的争论，另一个是 19 世纪早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围绕自由主义和重商主义的争论，^② 那么这两部教科书则分别沿袭了这两个学术传统。

2001 年，复旦大学樊勇明出版了《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一书，对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主要的 IPE 理论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介绍，该书成为中国学者全面了解美国 IPE 三大范式的主要渠道。^③ 而且该书明显受到吉尔平所奠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体系的影响，将国际政治经济学放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范畴下。^④ 从此以后，“吉尔平式”的 IPE 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得到普遍接受，并成为主要的学科框架。很多学者都沿着这条路线图对西方特别是美国 IPE 的理论体系进行了进一步的详细梳理和评介，从而将中国对西方 IPE 的流派分野和基本认识推向深入。^⑤

①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十四章，第 516—555 页；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46—359 页。

② 宋新宁较早地评述了 IPE 与这两个学术源头的关系，参见宋新宁《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研究的新领域》，《国际论坛》1999 年第 2 期，第 3—10 页。

③ 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④ 樊勇明自己也公开承认这一点，参见樊勇明主编《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流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 页。

⑤ 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历史、理论与方法》，《欧洲》2002 年第 1 期，第 27—37 页；宋伟，第 27—37 页；《国际政治经济学刍议》，《欧洲研究》2003 年第 1 期，第 92—108 页；严波：《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流派》，《国外社会科学》2004 年第 3 期，第 9—13 页；张建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一种理论范式》，《外交评论》2007 年第 2 期，第 26—33 页。

2003 年,北京大学王正毅(合作者张岩贵)出版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历史、理论与方法》,系统归纳了西方八大国际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其中就包括三个被认为是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源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从而为中国理解西方 IPE 的发展逻辑提供了另外一条学术线索。

教材是学科立命之本。上述三部颇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相互补充,有力促进了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发展。^①同时,由于三部书的作者分别身处中国高校国际关系研究和教学的三大重镇,他们也成为中国第一代 IPE 学科建设的带头人,是 21 世纪头十年培养中国 IPE 学术人才特别是博士生的最主要力量。不仅如此,在 2003 年前后,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分别设置了专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系所和专业,开始进行独立的 IPE 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这标志着 IPE 的教学在中国步入了制度化的轨道。^②

不容忽视的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之外,也有部分学者致力于经济外交学科的建设。^③不过,中国还没有学者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外交的关系进行一个比较准确的说明。

(二) 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一个学科之所以可能区别于其他学科而独立存在,不一定是由于该学科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而是在于它拥有只属于这个学科的理论范式和研

^① 其中樊勇明的著作进行了重新修订和再版,参见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而王正毅也独立出版了新的教材,参见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此外,中国一些其他的教科书还可参见彭澎《国际政治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朱文莉《国际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李滨《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视野下的市场与国家》,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邝梅《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因素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张宇燕、李增刚《国际经济政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② 当然,IPE 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或系所,在中国仍然不乏争议,有学者包括 IPE 学者就认为它不能构成一个和国际政治学平行的专业。

^③ 代表性学者有北大的张学斌、清华的何茂春和外交学院的周永生。参见张学斌《经济外交》,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周永生《经济外交》,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年版;以及由何茂春主编的《中国经济外交》年刊。

究路径。理论是学科发展的基石。国际政治经济学要想在中国获得一定的学科地位,就必须有一批学者队伍集中于推动该学科的理论发展。而事实上,在这十年里,中国 IPE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对西方既有理论成果的引进和介绍。

第一,新马克思主义。中国虽然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但这种传统与新马克思主义的 IPE 研究并无多少直接的学术渊源。除了王正毅在世界体系论方面的研究一直在国内 IPE 学界处于重要地位以外,进入 21 世纪,作为中国最早从事 IPE 研究的学者之一,李滨的理论研究集中于评述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分支——葛兰西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罗伯特·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①不仅如此,李滨还运用考克斯所奠定的学术框架对国际体系的演进进行了出色的分析。^②在很多中国学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 IPE 理论的同时,张建新对拉美国家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依附论进行了全面的评介,分析了其理论起源、内部流派的分野以及该理论的缺失。^③

第二,国家主义理论。IPE 中的国家主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又可以称为经济民族主义理论,它与古典重商主义、新贸易政策理论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学术联系,强调国家在世界市场中的主动作用,国民财富的增长不仅仅依靠市场自由发挥作用,还需要国家制定合适的政策甚至是保护主义和民

① 李滨 《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葛兰西学派》,《欧洲》2000 年第 1 期,第 20—30 页;李滨:《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 年第 5 期,第 38—39 页;李滨 《考克斯的批判理论:渊源与特色》,《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 7 期,第 15—20 页;李滨 《批判者的异同:考克斯与后现代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 年第 1 期,第 23—29 页。该领域的跟进者白云真也有类似的成果,参见白云真 《新葛兰西学派及其批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 年第 2 期,第 80—95 页。

② 李滨 《国际体系研究:历史与现状》,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③ 张建新 《依附论与拉美国际政治经济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08 年第 6 期,第 204—218 页;张建新 《从依附到自主: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成长》,《外交评论》2009 年第 2 期,第 114—122 页。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参见张建新 《激进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族主义的政策。较早进行国家主义理论研究的是李滨，他认为经济全球化必然会引起主权的转渡或削弱，但国家仍是全球经济网络中最重要的主体，追求权力的本能也必然反映在国际经济舞台的竞争中。^① 此后庞中英对经济民族主义进行了系统和全面的研究，不仅追溯了经济民族主义的历史源头，而且对经济民族主义在当代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全面考察。他认为，经济民族主义产生的根源在于，市场开放的进程中，商品、资本和信息都实现了自由流动，而劳动力却无法自由流动，这导致劳动者需要诉诸国家的力量来干预市场，防止生产要素过度流动进而减少自身福利。^② 田野等不仅评析了国家主义对于研究国家对外经济政策中的意义，^③ 而且田野还提出了关于国家自主性的研究框架，认为国家通过将国际制度引入国内治理的方式，来增强其相对于社会力量的自主性，进而实现国家自身的战略目标。^④

第三，霸权稳定论。霸权稳定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一支理论，它存在两个分支，一是国际安全领域的霸权稳定论，以吉尔平的霸权战争理论和乔治·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的霸权周期理论为源头；二是国际经济领域的霸权稳定论，以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国际公共产品的逻辑为源头。中国学者对霸权稳定论的评述与创新性研究也是沿着这两条不同的路径展开的。在 20 世纪 90 年代，秦亚青和王在邦以自己的实证研究结果，分别对两支颇有区别的霸权稳定论进行了最为全面的批判。^⑤ 进入 21 世纪，霸权稳定论继续

① 李滨 《经济全球化中国家的作用：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观》，《欧洲》1998 年第 2 期，第 25—35 页。此后，李滨进一步关注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作用的变化，参见李滨：《论经济全球化中国家的被动防护作用与积极作用》，《教学与研究》2005 年第 5 期，第 69—74 页。

② 庞中英 《权力与财富：全球化下的经济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③ 田野、于敦海 《对外经济政策分析的国家主义视角：缘起与流变》，《外交评论》2008 年第 10 期，第 95—102 页。

④ 田野 《国际制度与国家自主性：一项研究框架》，《国际观察》2008 年第 2 期，第 26—32 页。

⑤ 王在邦 《霸权稳定论的批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考察》，北京，时事出版社 1994 年版；秦亚青 《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对中国的 IPE 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很多中国学者的作品中都有霸权稳定论的影子。由于中国处于一种与霸权相对的国际角色,大多数学者对其持批判态度。也有中国学者继续对霸权稳定论的发展和在新时期下如何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进步进行了追踪式的研究。^①

第四,相互依赖理论。相互依赖不仅仅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即便是在整个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相互依赖的现实不仅仅是国际经济关系的一种结构性变化,还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安全关系。余万里系统评估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对相互依赖理论在基本概念、相互依赖与权力的关系、相互依赖与和平的关系等问题上的分歧。^②不仅如此,余万里、郎平和宋国友还在相互依赖理论的框架下对中美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考察了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现实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中美政治关系。^③相互依赖理论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发展成为更加精致的贸易和平理论,很多西方学者尝试在贸易关系与国际冲突之间寻求更加明确的因果逻辑关系,而且普遍使用定量工具进行因果检验。在中国,邝艳湘一直是集中研究贸易和平论的代表性学者,而且她是中国 IPE 界少数能够使用定量方法和博弈论进行该项研究的学者,从而使她的研究更加接近该领域的国际主流。^④

第五,国际制度理论。国际制度是中国学者的热门研究领域,这在很

① 代表性的研究有樊勇明《霸权稳定论的理论与政策》,《现代国际关系》2000 年第 9 期,第 20—23 页;钟飞腾《霸权稳定论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 4 期,第 109—122 页。

② 余万里《相互依赖评述》,《欧洲研究》2003 年第 4 期,第 52—61 页;更加早期的文献评述参见梅然《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欧洲》1998 年第 5 期,第 20—27 页;苏长和《经济相互依赖及其政治后果》,《欧洲》1998 年第 4 期,第 34—39 页。

③ 余万里《中美相互依赖的结构:理论分析的框架》,《国际论坛》2007 年第 2 期,第 52—57 页;郎平《贸易何以促进和平:以中美关系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 年第 11 期,第 24—31 页;宋国友《中美相互依赖及其战略限度》,《现代国际关系》2007 年第 5 期,第 58—64 页。

④ 邝艳湘《经济相互依赖与国际和平》,《外交评论》2007 年第 1 期,第 65—72 页;邝艳湘、向洪金《贸易与国际冲突的因果检验》,《国际政治科学》2009 年第 2 期,第 1—26 页;邝艳湘《国际贸易和平研究的演化:理论与实证的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 年第 5 期,第 81—93 页;邝艳湘《经济相互依赖、退出成本与国家间冲突升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 4 期,第 123—138 页。

大程度上与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大规模融入国际社会有关。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一支，国际制度理论在美国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有着非常亲密的学术联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早期的国际制度研究大都集中于对国际经济制度的研究；国际制度研究的很多成果都借助了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方法。罗伯特·基欧汉既是自由制度主义的开山鼻祖，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

但并非所有的国际制度研究都属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就犹如霸权稳定论一样，国际安全领域和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都存在对国际制度的大量研究，而且产生了经济学理性主义和社会学建构主义两种主要的研究路径。^① 在 IPE 领域，国际制度理论研究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是苏长和田野，他们都坚持了一种理性选择的研究路径。在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随着西方制度主义理论在中国引进潮流的终结，^② 中国 IPE 领域的制度主义者开始朝向对具体的国际经济制度的实证研究，并且产生了一系列丰富的学术成果，展示了国际制度研究在中国所具有的生机和活力。其中，苏长和领衔的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学术团队和田野的个人研究一直处于重要的地位。^③

田野尝试用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分析法对国际制度的选择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迈出了中国学者在国际制度领域进行理论创新的重要一步。^④ 此后，田野开始探讨国际制度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机制，^⑤ 并和他的学生或同事致力于对具体案例的实证研究，特别是与中国相关的国际制度的研

① 对于国际制度理论与 IPE 研究的关系，笔者感谢与苏长和的通信。他提醒笔者注意多个学科对国际制度问题的介入，他认为这正是国际制度研究充满活力的一个表现。而且苏长和也认为，他本人从事的制度研究就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② 参见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门洪华《对西方国际机制理论主要流派的批判》，《国际政治研究》2009 年第 1 期，第 110—117 页。

③ 即便是苏长和于 2010 年调往复旦大学之后，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这个以国际制度为中心的研究团队依然存在着。

④ 田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⑤ 田野《国际制度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机制：来自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解释》，《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 年第 1 期，第 5—24 页。

究,其研究对象包括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中国参与 APEC、国际劳工组织的系列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① 苏长和也在后来逐渐转向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实证研究,除了他本人致力于建立一个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一般性研究议程之外,他的团队在具体案例研究中也获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② 此外,也有一些其他学者以具体的国际制度为对象,展开了丰富多彩的研究,他们共同推动国际制度研究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最具有生机和活力的研究领域。^③

第六,地区主义理论。王正毅与美国学者迈尔斯·卡勒 (Miles Kahler) 和日本学者高木诚一郎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展开了一项对亚太地区主义的跨国联合研究,涉及亚太区域化的制度建设、安全合作和经济收益等问题,这是中国 IPE 学者在早期所产生的最重要的地区主义研究成果。^④ 21 世纪的头十年,多哈回合谈判长期踟躇不前,区域合作高歌猛进,地区主义在中国也成为欣欣向荣的研究领域。陈玉刚和肖欢容最早对西方地区主义理论进行了介绍,^⑤ 此后地区主义在中国进入经验实证

① 参见王一鸣、田野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制度选择》,《国际政治科学》2009 年第 3 期,第 59—82 页;田野 《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形式选择:基于 APEC 和 CAFTA 的比较分析》,《教学与研究》2008 年第 9 期,第 59—65 页;田野、林菁 《国际劳工标准与中国劳动治理:一种政治经济学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 年第 5 期,第 6—16 页。

② 苏长和 《中国与国际制度:一项研究议程》,《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 年第 10 期,第 5—10 页;朱杰进 《非正式性与 G20 机制的未来发展》,《现代国际关系》2011 年第 2 期,第 41—46 页;朱杰进 《八国集团与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供给:集体霸权的视角》,《国际政治研究》2009 年第 1 期,第 118—131 页;刘宏松 《中国参与非正式国际制度:以 APEC 和 ARF 为例》,《国际展望》2009 年第 1 期,第 42—54 页;汤蓓 《公平性原则的回归:世界卫生组织与中国卫生体系改革》,《国际政治科学》2010 年第 1 期,第 1—24 页。

③ 王荣华、陈寒溪 《国际制度与中国红十字会立法》,《国际政治科学》2007 年第 1 期,第 1—30 页;崔志楠、邢悦 《从“G7 时代”到“G20 时代”: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变迁》,《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 年第 1 期,第 134—154 页。

④ 该项研究名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亚太地区主义”(1995—2000 年),是在美国亚洲国际问题研究促进会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Asia, PISA) 资助的一个国际合作项目,其最终成果的中文版参见王正毅、迈尔斯·卡勒、高木诚一郎主编 《亚洲区域合作的政治经济分析:制度建设、安全合作与经济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⑤ 陈玉刚 《国家与超国家:欧洲一体化理论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肖欢容 《地区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3 年版。

的研究阶段，而且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特定领域。耿协峰运用苏珊·斯特兰奇的结构主义分析路径对亚太地区主义进行了实证分析。^①宋新宁探讨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经验，认为欧洲一体化离不开国家让渡主权的意愿，正是政治一体化推动了经济的一体化。^②郭宏则用市场全球化和国内政治特点两个变量解释了东盟的经济地区主义为何同时存在着开放性和发展性的双重特征，并预测未来东盟经济地区主义面临的主要挑战仍然是政治精英如何平衡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之间的紧张关系。^③这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 IPE 学界非常流行的国际—国内相互关联的分析框架。

而由樊勇明领导的复旦大学 IPE 研究团队则致力于从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新视角来研究区域一体化问题。樊勇明在国内学者中率先把霸权稳定论中的国际公共产品的概念延伸，提出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概念，进而以之解释区域层面的经济合作。^④此后，樊勇明组织了一项集体研究，不同的学者通过考察不同的区域一体化经验，以分析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规律，对区域性公共产品的理论进行了丰富和完善。^⑤

（三）对西方前沿研究的介绍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出现了一个学术转向，即由构建宏观理论范式转变为在具体议题领域内探求更加精确的因果机

① 耿协峰 《新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结构变动》，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② 宋新宁 《欧洲一体化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国际观察》2004 年第 5 期，第 1—10 页。

③ 郭宏 《全球市场：国内政治与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9 年版。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还可参见姜运仓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8 年版。

④ 樊勇明 《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解释区域合作的另一个理论观点》，《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 年第 1 期，第 7—13 页；樊勇明 《从国际公共产品到区域性公共产品：区域合作理论的新增长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 1 期，第 143—152 页。

⑤ 张建新主编 《国际公共产品与地区合作》，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该文集的不少作者都是樊勇明教授关于“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学术研究团队中的成员。

制。这一转向也影响了中国的 IPE 研究。在 20 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下半期,与前半期主要致力于介绍西方宏观理论范式不同,已经有一些学者致力于追踪西方学者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发展方向。

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从诞生伊始就存在两条不同的研究路径,一条是以基欧汉、吉尔平和克拉斯纳 (Steven Krasner) 为代表的国际体系的研究路径;一条是以卡赞斯坦、罗高斯基 (Ronald Rogowski) 和古勒维奇 (Peter Gourevitch) 为代表的国内政治的研究路径。到 20 世纪 90 年代,这两条路径逐渐汇集到一起,并吸引很多中国学者的关注。

朱文莉和王勇较早地就注意到,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最新进展就是国际与国内互动的研究成为主流。朱文莉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上述两条路径可以分为宏观角度和微观角度,众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开始致力于融合宏观与微观层次的研究,希望真正打破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的界限。^①王勇则直接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正向“全球政治经济学”的方向发展,同时出现国内与国际两个层次整合的研究趋势。^②王正毅详细介绍了美国以海伦·米尔纳 (Helen Milner) 为代表的第二代 IPE 学者的研究议题和研究成果,认为第二代学者正在全面打破第一代学者所奠定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框架,从而将中国学者对美国 IPE 的理解和认识推进到了“后吉尔平时代”。^③郎平以《国际组织》杂志在 2000 年以后所发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作品为样本,考察了美国主流 IPE 在经济全球化、贸易政策偏好、货币制度选择、民主化、国际经济环境以及经济相互依存等问题上的最新研究,为中国学者了解美国 IPE 不同议题领域的最新状况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参考。^④此外,还有一批年轻的中国学者也开始在某些专门的议

① 朱文莉 《世纪之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研究》2002 年第 1 期,第 95—96 页。

② 王勇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新进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 年第 5 期,第 40—41 页。

③ 王正毅 《超越“吉尔平式”国际政治经济学: 1990 年代以来 IPE 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国际政治研究》2006 年第 2 期,第 22—39 页。类似的评述还可参见雷达、孙中楦 《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背景、特征及其理论超越》,《教学与研究》2010 年第 1 期,第 51—58 页。

④ 郎平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载王逸舟主编 《国际政治理论与战略前沿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9—63 页。

题上逐渐逼近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前沿。

曲博和钟飞腾都注意到美国 IPE 一个主要的发展方向就是国考察内政治制度如何影响国内社会利益的汇总,塑造国家对外的政策偏好,进而通过国际层面的谈判与协调影响国际经济关系。^①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种发展方向一方面与整个国际关系理论在冷战结束后出现层次回落息息相关,^② 另一方面也源于国际经济关系天然比国际安全关系更加受到国内社会私人力量的推动,所以在整个分支学科的发展趋势上,国际政治经济学一直在拉近国际关系学和比较政治学之间的距离。在此基础上,李巍则对国际政治经济学“IO 学派”40 年的学术演进逻辑进行了全景式扫描。他认为近 20 年来打通国际与国内的跨层次研究路径在美国兴起,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全面合流,进而出现了“全球政治经济学”的新范式,呼应了王勇在六年前所作出的判断。^③ 而白云真则观察到跨大西洋的美国和英国 IPE 在知识传统、方法论、议题设置等多维度的差异,并作为中国学者首次从历史背景、学术传统以及学术训练等多方面对其进行了解释。^④

二、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议题领域

与国际安全领域的研究不同,近来受到批判的“三大主义式”论文

① 曲博《偏好、制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外交评论》2006 年第 5 期,第 103—109 页;曲博《国际经济合作的国内制度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 年第 1 期,第 61—68 页;钟飞腾《社会行为体与政策偏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 年第 4 期,第 54—62 页。而李巍的博士论文则正是依靠这一研究路径进行实证研究的作品,参见李巍:《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② 李巍、王勇《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回落》,《国际政治科学》2006 年第 3 期,第 116—118 页。曲博也在另一篇文章中讨论了将国内政治引入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理线索,参见曲博:《国内政治、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06 年第 2 期,第 62—72 页。

③ 李巍《国际政治经济学演进的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 年第 10 期,第 68—80 页;类似的分析还可参见吉宓《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 年第 2 期,第 67—73 页。

④ 白云真《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跨大西洋分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 4 期,第 139—154 页。

并没有在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占据主流。最近十年中国的 IPE 研究一开始就进入了一个具体议题的研究中,实证研究而非理论追踪,一直是这十年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流,并在各个议题领域中诞生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①

(一) 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国际贸易是国际经济活动最原初的表现形式,国际贸易政治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基础领域,中国最初的改革开放也是从贸易领域开始的。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大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果都是在贸易政治领域,它既包括对多边或双边贸易关系的研究,也有对单个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研究。

王勇多年以来一直非常专注地耕织于中美贸易关系。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美告别 80 年代的“蜜月期”,受政治因素干扰,中美贸易关系成为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摩擦频仍的领域,王勇在这一时期赴美进修国际政治经济学,他以当时中美最急迫的“最惠国待遇”问题为研究对象,以利益集团理论为基础,完成了关于中美贸易关系政治分析的一部力作。^②

进入最近几年,中国学者已经不满足于对贸易关系和贸易政策的描述性研究,开始借助某一特定的路径和模式进行更加理论化的研究。具体而言,在贸易政治领域主要存在三种研究路径:以国际体系为中心的研究路径,以国内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和以国家政府为中心的研究路径。^③ 21 世纪头十年中国的国际贸易政治研究在理论化水平上出现了进步,在这三条研究路径上都形成了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① 中国对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引进和介绍的一个主要的方式就是翻译,在过去十年,中国学者翻译了不少西方的经典作品。

② 王勇 《最惠国待遇的回合: 1989—1997 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

③ 李巍 《体系·社会·国家: 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三种研究路径》,《国际观察》2008 年第 1 期,第 72—79 页。曲博则比较了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研究对外经济政策的不同视角,参见曲博 《国际力量、国内政治与对外经济政策选择》,《教学与研究》2007 年第 1 期,第 77—83 页。

中国加入 WTO 彻底终结了中美间的“最惠国待遇”之争，但两国经贸关系中的摩擦与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相反，经贸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在 21 世纪初全面上升。王勇继续对中美经贸关系中更加丰富的问题领域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包括纺织品贸易、出口管制、人民币汇率等等，并成为中国 IPE 学界研究中美经贸关系的代表性学者。^① 由于美国的“弱政府、强社会”的结构特征，王勇在分析美国对华经贸政策时，一以贯之地采用了社会中心论的研究路径，即强调利益集团而不是政府本身对美国贸易政策的塑造作用。^②

不仅如此，王勇还试图建立起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框架。正是在上述学术理念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一种分析国际贸易政治的国家—社会—市场的三维分析框架。^③

进入 21 世纪，中国成为国际贸易体系中最大的受益者，但也因此与主要发达国家进入了“摩擦多发期”，特别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尤其令人关注，这和 20 世纪后半叶的日美贸易摩擦有很大的相似性。为此，长期以日本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樊勇明和他的学生贺平展开了一项联合研究，该项研究回顾了日美经贸摩擦中“贸易摩擦—汇率摩擦—体制摩擦”的发展演变轨迹，厘清了三者的内在递进关系，并分析了入世后中外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的发生和发展也具有类似的特点。他们认为，伴随着经济上的崛起，中国进入一种所谓的“战略性贸易摩擦期”，而这具有大国崛起的必然性。^④ 这项重要的比较研究为理解中国崛起后的对外经济关系提供了一个简约的观察视角。

① 王勇 《中美经贸关系》，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7 年版。

② 类似的作品还有李晓岗 《劳工组织、国内政治与冷战后美国贸易政策》，《美国研究》2001 年第 3 期，第 47—61 页。

③ 王勇 《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8 年版。

④ 樊勇明、贺平 《经贸摩擦与大国崛起：日美经济战对中国的启示》，《日本学刊》2006 年第 3 期，第 99—110 页。该项目的其他相关成果参见樊勇明、贺平 《日美贸易摩擦对日本国内改革的影响》，《现代日本经济》2009 年第 1 期，第 25—30 页；贺平 《多边贸易体制下日美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研究》，《复旦学报》2009 年第 6 期，第 91—97 页；贺平 《日美贸易摩擦中的美国“对日修正主义”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08 年第 1 期，第 72—78 页。

也有一些学者集中于对单个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研究。张建新分析了美国在克林顿时期的贸易政策走向,他认为克林顿政府在冷战后对国际结构的认知和对美国角色的重新定位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贸易战略的选择。^①这是一种国家—体系的分析路径,从而与王勇的社会中心论拉开了距离。

20世纪90年代以来,考察国内制度与对外经济政策的关联性,成为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路径。在中国,有一些早期的文献已经开始对美国贸易决策机制进行分析。^②此后,也有一些学者不满足于对美国对外经济决策机制的描述性分析,而是致力于从理论上回答国内制度安排如何约束了国家的贸易政策。有学者考察了美国贸易代表作为美国贸易决策的核心机构,其在美国政府体系中制度角色的演进与变迁过程如何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调整,这是中国学者以新制度主义研究路径考察美国贸易政策的一次重要尝试。^③三年后,李巍对美国整个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度逻辑进行了更为系统性和理论性的分析,他分析了美国国际贸易政策的几个历史性转折,如1913年美国走向自由主义的开始及夭折,1934年美国彻底告别保护主义,1974—1988年美国从自由贸易向公平贸易政策的转向,等等。李巍认为,美国制度结构的变迁导致国际体系和国内社会传递关于贸易政策的信息渠道发生了变化,从而促成了政策的调整。^④

与王勇的社会中心论、张建新的国家中心论和李巍的制度中心论所坚

① 张建新 《权力与经济增长:美国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对美国贸易政策的类似研究还可参见何永江 《美国贸易政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 参见潘锐 《美国国际经济决策过程中的政府部门》,《太平洋学报》1997年第3期,第65—71页;金灿荣 《国会与美国贸易政策:历史和现实的考察》,《美国研究》2000年第2期,第7—30页。

③ 孙哲、李巍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与美国国际贸易政策》,《美国研究》2007年第1期,第68—106页。此后,也是从美国国内政治制度的角度,孙哲和李巍系统考察了美国的国会制度如何影响了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制定,该项研究虽然也涉及了美国对华金融政策和投资政策,但对华贸易政策无疑是最重要的内容,参见孙哲、李巍 《国会政治与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④ 李巍 《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持的单一研究路径不同，也有学者分别从行政部门、国会和公众三个不同的维度分析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来源和动力。^①此外，还有学者考察了美国的党派政治对美国贸易政策变迁的影响。^②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 IPE 学者在投入大量资源研究美国贸易政治的时候，关于中国自身的贸易政策和决策制度却少人问津，即便是研究中美经贸关系的学者也大都以美国为主动方而中国为被动承受方来进行考察，这种现象颇为吊诡。^③而这个空白最终是由经济学界的盛斌来填补的，着实令中国的 IPE 学者感到汗颜。盛斌运用西方国际贸易政治学的概念框架和方法论，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制定的政府行为、决策过程和制度约束，并以中国工业的保护结构为重点，实证性地研究了中央政府、利益团体、公众、世界贸易体系和外国政府对贸易政策的影响。^④由于其运用的分析工具都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之内，因此，在中国 IPE 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自由贸易协定（FTA）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贸易体系的一个突出现象，它一方面是全球多边贸易谈判难以向前推动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在保护国内社会与寻求自由贸易福利妥协的产物。关于 FTA 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已经能够成为中国近年来国际贸易政治研究的一个主要热点。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对 FTA 的研究主要是考察其背后的外交战略因素，将 FTA 视作其政治战略的一环以及其政治条件，而非从纯经济学角度考虑其经济条件和经济收益。由于中国参与 FTA 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因

① 李淑俊 《公众与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制定：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 年第 8 期，第 60—70 页；李淑俊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对美国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 年第 3 期，第 47—52 页；李淑俊、郭增棕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国会因素》，《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 年第 4 期，第 94—97 页；李淑俊 《从公众—国会—政府的互动关系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美国研究》2007 年第 4 期，第 81—94 页。当然，这种综合性研究方法，在方法论上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② 屠新泉 《党派政治与美国贸易政策的变迁》，《美国研究》2007 年第 4 期，第 67—80 页。

③ 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恐怕在于中国对外经济决策体制的“黑箱”特征，由于政策制定的“保密性”和“集中性”导致中国 IPE 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存在极大的信息获取障碍。

④ 盛斌 《中国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此,中国学者主要研究东亚和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进程,而且由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天然存在,考察美国霸权对东亚 FTA 的影响,是中国学者的主要关注点。^①

FTA 通常是以地域为基础的,但有学者认为,跨区域 FTA 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地理位置毗邻是地区一体化发展的必要要素这一条件,并进一步认为这种舍近求远的 FTA 所能实现的经济福利是有限的,其成立的动机主要在于两国间的政治利益或其他经济利益。^②

在国际贸易政治中,技术出口的管制由于其高度的政治性受到了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关注。技术管制是政治力量干预贸易政策影响国际贸易关系的典型案例,特别是美国对华技术管制对中国构成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该领域受到中国学者的较多关注。^③

宋国友试图发展出关于国家对外贸易战略选择的一般性理论模型,该模型认为社会行为体对经济福利的追求和国家对安全利益的追求发生了矛盾,作为国家和社会博弈的结果和输出,政府的对外贸易战略总是在国家偏好与社会偏好之间获取某种平衡。^④ 宋国友的研究可以视为中国学者在研究安全与贸易的关系并试图发展一般性的贸易战略选择理论,其做出了

① 宋国友 《美国的区域贸易协定政策》,《现代国际关系》2003 年第 12 期,第 49—53 页;宋国友 《美国的东亚 FTA 战略及其对地区秩序的影响》,《当代亚太》2007 年第 11 期,第 34—40 页;宋国友 《东亚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与美国霸权的变迁》,《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 7 期,第 56—61 页;盛斌 《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政治经济分析: 中国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 年第 3 期,第 62—71 页;盛斌 《亚太区域合作的新动向: 来自竞争性构想的洞察》,《国际经济评论》2010 年第 3 期,第 123—137 页。其他的研究参见何江永 《竞争自由化战略与美国的区域贸易安排》,《美国研究》2009 年第 1 期,第 98—118 页;张振江 《亚太自由贸易区: 美国战略与中国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 年第 4 期,第 50—56 页;崔荣伟 《体系、社会和国家: 理解〈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当代亚太》2010 年第 2 期,第 73—90 页。

② 孙玉红 《跨区域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政治经济动机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 年第 7 期,第 72—78 页。

③ 代表性的研究有余万里 《美国对华技术出口: 管制及其限制》,《国际经济评论》2000 年第 4 期,第 48—52 页;刘子奎 《冷战后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改革和调整》,《美国研究》2008 年第 2 期,第 107—127 页。

④ 宋国友 《平衡社会利益与国家安全: 政府对外贸易战略选择》,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7 年版。

比较重要的努力。

总体而言，由于中美贸易关系的重要性，中国 IPE 学者大量的研究成果集中在美国贸易政策领域，这种扎堆现象一方面说明了美国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学术资源的浪费。

（二）国际金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国际金融可以细分为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货币体系两个主要的研究领域。对于前者，主要指非生产性的国际资本跨国流动，以和跨国投资关系相互区别，它具体又包括国际信贷和证券投资等内容。对于后者，主要是指不同货币之间的关系安排，包括国际本位货币、汇率制度安排以及国际收支制度的安排等内容。两者虽然有区别，但又难以分离。

在国际资本流动领域，中国 IPE 学者的集中关注点主要在于国际金融危机、金融救援以及主权财富基金等议题。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国的金融霸权难以回避，很多研究金融政治的学者都围绕美国金融霸权展开。作为研究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一部专著，李巍专门分析了美国国际金融政策和金融外交在 20 世纪初发生重大调整的几个关键性案例，包括美国为何选择中断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何推动日元的升值以及为何分别在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采取“强势美元”政策和“弱势美元”政策等一系列重要案例，这些案例的分析都是基于他所建立的国内制度结构的解释模型。^①

IMF 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角色十分重要，李巍考察了美国控制的 IMF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多个地区性金融危机中的不同的援助行为，他认为冷战后由于国际政治结构的变化，导致美国的战略利益认知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将传统作为国际公共物品的 IMF “私有化”的倾向，美国完全依据本国利益而非国际金融体系稳定的角度来考虑 IMF 的救援行为。^②

① 李巍 《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② 李巍 《霸权国与国际公共物品》，《国际政治研究》2007 年第 3 期，第 164—186 页。

与李巍的研究虽然紧密相关，但杨国庆却集中于亚洲金融危机单个案例，他认为，正是美国的金融霸权对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蔓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美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获得了大量的政治和金融收益，而此后亚洲金融合作正是对美国金融霸权的回应。^①

21 世纪的头十年，国际金融领域最受瞩目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主权财富基金的兴起。由于主权财富基金是国家掌控金融资源流动的一种新形式，因此其诞生伊始就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从而受到 IPE 学者的关注。宋国友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中最早对主权财富基金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主权财富基金的大规模出现是主权国家对美国过分推进金融自由化的一种必然反弹，只要美国不停止其对金融霸权红利的过度享用，其他受此影响的国家就会利用主权财富基金对美国的金融霸权形成挑战，并越来越成为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2008 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金融安全和所谓的“美元陷阱”问题成为中国学者讨论最为热烈的话题，但该议题的研究和讨论基本被经济学者所垄断，中国的 IPE 学者很少在该领域发表有分量的学术作品。宋国友是少数在该领域有所成果的 IPE 学者，他用“美元陷阱”和“债务武器”两个简约的概念来抽象中美金融关系的现实，两者分别描述了中国和美国在双方金融战略关系中的忧虑和关切，尽管如此，他认为这种战略关系是严重不对等的，中国对“美元陷阱”的关切度远远高于美国对“债务武器”的关切度。^③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出台，直接引发了中国 IPE 学者对国际货币政治的关注。其中，尤其是对国际货币的控制如何产生权力关系，引发了中国 IPE 学者的兴趣，并在该领域产生了一些初

① 杨国庆 《危机与霸权：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② 宋国友 《主权财富基金与美国金融霸权》，《现代国际关系》2007 年第 9 期，第 36—42 页。

③ 宋国友 《美元陷阱、债务危机与中美金融困境》，《国际观察》2010 年第 4 期，第 72—79 页。

始的框架性和案例性研究成果。^① 而具体到该领域的特定议题，东亚货币合作是中国 IPE 学者的关注点。21 世纪的头十年，是国际货币体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十年，其突出表现就是欧元的诞生和北美地区美元化浪潮的兴起，再加之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迫使东亚顺应区域性货币一体化的潮流，展开了切实的地区货币合作。王勇辉详细分析了东亚货币合作的政治基础，认为东亚货币合作尽管具有各种经济上的条件，但大国间的政治纷争影响了这一合作进程。这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东亚货币合作所进行的最系统的研究，从而打破了长期以来经济学者在该领域的垄断地位。^②

汇率安排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内容，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一种新的无政府状态之后，汇率制度的选择就一直是学术界和政治决策者关注的重要议题。但是，对汇率政策的纯经济学分析是不够的，从相当程度上讲，一国的汇率，尤其是大国的汇率，是由现实中的各种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因素及其互动决定的，因此需要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介入。在过去 30 多年中，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对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进行了富有开创性的研究。^③ 但在中国，由于汇率问题高度的技术性，绝大部分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此采取了回避态度，通常是一些经济学背景出身的学者耕耘在这个领域，代表人物就是张宇燕和何帆。

何帆等较早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汇率变动及汇率制度的选择，他强调汇率的变动在国内所带来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并影响到国内不同利益集团对汇率政策的偏好。同时，他还分析了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的

① 王湘穗 《币缘政治：世界格局的变化与未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 年第 4 期，第 10—24 页；陈平、管清友 《大国博弈的货币层面：20 世纪 60 年代法美货币对抗及其历史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 年第 4 期，第 25—47 页；李巍 《货币竞争的政治基础：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外交评论》2011 年第 3 期，第 44—61 页。

② 王勇辉 《东亚货币合作的政治经济分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 年版。

③ 王正毅和曲博阐述了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三种重要解释路径（霸权偏好论、社会集团论和国内制度论），参见王正毅、曲博 《汇率制度选择的政治经济分析》，《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5 期，第 59—65 页。

互动关系、利益冲突和政治博弈始终影响着货币联盟的演进。通过引入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项研究给汇率变动及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提供了比纯经济学更加广阔的视角。^①

中国在 2001 年正式加入 WTO,这极大刺激了中国的对外出口,中国过去长期所奉行的事实上的钉住汇率政策开始遭到越来越多的国际质疑,正如宋国友的判断,中美经济关系的重点也逐渐从传统的贸易领域转向金融和货币领域。^②从 2003 年开始,中美之间一场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争论一直绵延至今,成为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核心困扰性问题。但长期以来,经济学者垄断了在该领域的学术和政策话语权。王勇在《中美经贸关系》中有一章节分析了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突出了美国国内受到从中国进口影响的相关利益集团在游说国会施压人民币升值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这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该问题讨论的少有的介入。^③张宇燕等以中美之间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争论为背景,力求说明,在一国内部,汇率是相关利益集团和拥有特定政治经济政策目标的政府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而在国际上,汇率则是大国实现或巩固有利于己的世界经济政治安排的一个重要工具,国际汇率体系所反映的实乃国际政治的权力结构。^④这是中国学者中少有的将汇率问题纳入 IPE 而非单纯的经济学框架中的努力。

随着 WTO 管理下的国际贸易体系日渐走向法制化,而经济相互依赖加剧了国际金融的动荡与不安,一些非常紧要的国际金融政治议题逐渐涌现出来,比如东亚货币合作、人民币汇率争端、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外汇储备战略、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欧元体系的危机和走向等,而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听到更多的是纯经济学者声音,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几乎

① 何帆、李志远 《汇率变动与汇率制度变革的政治经济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 年第 11 期,第 26—31 页。

② 宋国友 《从贸易到金融: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调整》,《现代国际关系》2007 年第 4 期,第 33—38 页。

③ 王勇 《中美经贸关系》,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第 7 章,第 272—333 页。

④ 张宇燕、张静春 《汇率的政治经济学:基于中美关于人民币汇率争论的研究》,《当代亚太》2005 年第 9 期,第 3—20 页。

处于全面的“失语”状态，这种状况令人十分忧虑。以余永定、何帆、张斌和张明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团队是该领域的核心代表人物（2009年张宇燕从亚太所调入该所任所长，加入了这个团队并成为领导者），并且诞生了影响非常广泛的学术成果。^①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并非进行纯粹的经济学分析，也有意识地将政治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中，但是他们与中国相关领域的国际关系学者交流较少，或者就根本没有相应的国际关系学者可与之对话讨论。

这一方面说明国际金融政治在中国的研究还十分不足，另一方面又预示着该领域对中国 IPE 学者而言，蕴藏着巨大的学术机遇。

（三）跨国投资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跨国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指对包括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在内的跨国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跨国公司是跨国投资的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研究对象，但主权国家作为政治变量被纳入其中，从而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学对跨国公司的研究与经济学和管理学对跨国公司的研究相互区别。罗伯特·吉尔平在1975年出版的《美国权力与多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最早提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而这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正好是一部专门研究跨国公司的著作。可以说，国际政治经济学与跨国公司是世界政治经济大变革所催生出的一对孪生子。^②

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专门议题领域，跨国公司与母国和东道国

① 他们比较有影响力的研究论文有余永定、何帆、李婧《亚洲金融合作：背景、最新进展与发展前景》，《国际金融研究》2002年第2期，第6—12页；何帆、张斌《如何应对经济崛起时期的汇率升值压力：日本、德国的经验与启示》，《国际经济评论》2004年第3期，第10—13页；何帆、覃东海《东亚建立货币联盟的成本与收益分析》，《世界经济》2005年第1期，第3—16页；何帆、李志远《汇率变动与汇率制度变革的政治经济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1期，第26—31页；何帆《危机之后的亚洲货币合作》，《国际经济评论》2001年第1期，第23—26页；何帆、张斌、张明《对〈清迈协议〉的评估及改革建议》，《国际金融研究》2005年第7期，第16—22页。

② Robert Gilpin, *U. 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的关系是研究焦点。余万里较早地梳理了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三大理论范式如何看待跨国公司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强调国家与市场、自由与公正、霸权与财富、跨国公司与国家主权,这一系列关系仍然决定着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跨国公司研究的基本范畴和理论分野。^①而钟飞腾则对国际学术界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最新文献进行了梳理,他分别从围绕利益而展开的国内联盟、国内制度两大分析范畴总结了 IPE 在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方面的最新学术进展,对于中国学者了解西方跨国投资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颇有裨益。^②

黄河对跨国公司如何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他梳理了关于跨国投资的相关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及其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运用,冷战中和冷战后跨国公司的不同角色和影响,并且对跨国公司与母国、东道国和国际组织的关系进行了全面阐述。^③黄河在跨国投资政治领域的学术努力与王勇在国际贸易政治领域的学术努力比较相似,他们都致力于建立起该领域的学术研究框架,以为今后的更加深入的问题导向的研究奠定基础。^④

在对西方跨国投资政治经济学研究前沿文献进行了梳理之后,钟飞腾此后在跨国投资政治领域展开了更加精细和具有问题性的研究,他分析了 1985—1993 年美国对日本直接投资挑战的应对。这项研究借助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二代学者创立的利益—制度分析框架,从国家、国内以及国际三个层面阐述了美国的应对之道。^⑤这是中国 IPE 学者在跨国投资政治领域所展开的少有的实证性研究。

① 余万里 《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评论》2003 年第 2 期,第 50—54 页。

② 钟飞腾 《国内联盟、制度与对外直接投资》,《国际政治研究》2006 年第 2 期,第 95—110 页。

③ 黄河 《跨国公司与国际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④ 类似的努力还可参见钟飞腾 《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一种分析框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 12 期,第 137—151 页。

⑤ 钟飞腾 《管理投资的自由化:美国应对日本的直接投资》,《当代亚太》2009 年第 6 期,第 5—26 页。

中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大规模接受外国直接投资 (FDI) , 并长期保持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第二大接受国的地位。而且从 2005 年开始, 中国政府开始支持企业 “走出去”, 逐渐成为对外投资的大国。无论是中国接受外来投资还是中国的对外投资, 都蕴涵着非常复杂而丰富的政治内容, 但显然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界对此研究还十分不充分, 跨国投资政治在中国的研究队伍还相对比较薄弱。

对中国接受外来投资及其政治后果进行了最富有影响力的研究的是现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的政治经济学教授、美国华裔学者黄亚生。与许多人为中国大量引进 FDI 而欢呼, 认为是中国改革的重大成就不同, 黄亚生在研究中提出了一个富有争议的反诘: 中国大量引进 FDI, 是因为中国经济存在某些本质弱点的表现。^① 另外一位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傅军在美国哈佛大学求学时也对中国的 FDI 政策进行了深入研究, 他使用了大量 (15 年系统的) 跨时空的经验数据, 通过数学模型, 在控制经济 (如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等) 和文化变量的前提下, 系统地求证了中国国内的政策、法律等制度性因素与外国投资行为的因果关系。^② 这是一部在方法论上达到了一定水准的作品。

由此, 中国的 FDI 在美国比在中国更加受到关注, 这种现象令人诧异。

(四) 能源、环境与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能源与环境问题同时也受到很多其他学科的关注。作为非传统安全的议题, 在最近十年逐渐成为国际关系学中的 “显学”, 它们也被归于广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能源与环境问题本来属于两个并不相同的

^① 参见 Yasheng Huang, *Selling Chin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uring the Reform Er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中译本参见黄亚生 《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 (钱勇、王润亮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5 年版。

^② Jun Fu, *Institutions and Investments: FDI in China during an Era of Reform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

问题,但近年来,低碳经济和新能源概念的流行,使得能源与环境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由于中国在能源与环境方面面临着日益突出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多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开始介入到该领域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具有国际关系学科特征的成果。

国际能源交易活动既涉及贸易,又涉及金融(比如能源期货),还涉及跨国直接投资,它虽是一个专门的议题但又涉及面极广。国际政治经济学框架下的能源研究突出国际能源交易的特殊性,强调该种商品在关涉国家安全上的敏感性,这使得其在国家间的交易行为不仅仅受市场的支配,而且还受到权力逻辑的影响,国家而不仅仅是企业也在国际能源交易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993年中国从原油净出口国变成原油净进口国,此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面临着严峻的能源安全(主要是石油安全)问题,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不断加入了讨论中国能源安全的行列,查道炯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性人物,他长期耕耘在该领域,诞生了一系列备受瞩目的学术成果。他的研究认为仅从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思维去观察中外在石油领域的互动将只能付出更大的代价,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其他国家并没有试图把能源作为阻止中国经济发展的工具,真正的威胁来源于中国能源消费的持续增长和能源利用率未能提高。中国需运用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智慧,利用中国与国际石油市场以及世界经济形成相互依赖的现实,通过驾驭这种相互依赖(主要是提高国内的能源利用率)来保障国家的能源安全。^①

随着中国在21世纪迅速崛起为世界能源市场上的主要力量,中国与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美国的关系就格外重要。吴磊专门对中美能源关系及其政治后果进行了分析,与查道炯相反,他展示了一种比较彻底的现实主义的框架,认为中美能源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的竞争和冲突

① 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如查道炯《中国石油安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查道炯《相互依赖与中国的石油供应安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6期,第15—21页;查道炯《中国的能源安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8期,第59—67页。

关系,而这种特征将全面影响两国的政治和外交关系。^① 最近几年也有其他相关学者开始在该领域内跟进,比如,张建新分析了美国霸权如何塑造了国际石油生产和贸易的秩序;^② 王海滨、薛力等都集中考察了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在国际能源竞争中采取何种战略选择才能保障能源资源的供应。^③

作为经济学界的代表,管清友是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而非纯经济学的方法进行能源问题(主要是石油)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他认为经济学家没有给出一个关于能源市场的比较完善的分析框架,能源价格的波动既是国际市场供求双方博弈的结果,也是“大国”关于能源利益分配的政治安排,权力与市场的互动关系成为他进行能源问题分析的主要框架。^④

环境问题在当今已经被迅速国际化。在该领域,薄燕、张海滨和于宏源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三位主要代表,他们从国际关系理论出发,探讨国际社会在环境问题上的合作与纷争以及特定国家环境政策的政治动因。^⑤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者关于国际环境政治的研究大都与国际制

① 吴磊 《能源安全与中美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② 张建新 《美国霸权与国际石油政治》,《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6 年第 2 期,第 26—31 页。

③ 王海滨、李彬 《中国对能源安全手段的选择与新安全观》,《当代亚太》2007 年第 5 期,第 21—30 页;王海滨 《后进入国家如何进入石油富聚区》,《国际政治科学》2007 年第 3 期,第 38—53 页;孙学峰、王海滨 《中国获取石油资源的战略选择》,《当代亚太》2010 年第 1 期,第 58—78 页;薛力 《核能与天然气:后京都时代中国能源的关键》,《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 年第 9 期,第 74—92 页;薛力、肖欢容 《中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缺陷与应对》,《当代亚太》2009 年第 2 期,第 74—92 页;薛力 《加拿大油砂开发与中国能源安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 年第 12 期,第 17—22 页。

④ 管清友 《石油的逻辑:国际油价波动机制与中国能源安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张宇燕、管清友 《世界能源格局与中国的能源安全》,《世界经济》2007 年第 9 期,第 17—30 页;管清友 《加入预期因素的多重均衡模型:市场结构与权力结构——国际市场油价波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 年第 1 期,第 69—74 页;李纪建、管清友:《石油双重属性与国际油价波动分析:一个国际政治经济的视角》,《国际石油经济》2007 年第 1 期,第 44—49 页;管清友、何帆 《中国的能源安全与国际能源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 年第 11 期,第 45—53 页。

⑤ 薄燕 《国际谈判与国内政治:美国与〈京都议定书〉谈判的实例》,上海三联书店 2007 年版;张海滨 《环境与国际关系:全球环境问题的理性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张海滨 《气候变化与中国国家安全》,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0 年版。

度联系在一起,强调国际机制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作用,这使他们的研究打上了自由主义的烙印,可以说,中国的自由制度主义者主宰了该领域的研究。^①

当然,是否应该将国际环境政治纳入 IPE 的学术体系,并非没有争议。反对者就认为,环境问题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议题,它与 IPE 的三大经典议题(贸易、金融和投资)没有直接关系,将其纳入国际政治经济学很可能破坏 IPE 作为一个分支学科的应有边界,何况环境政治的研究者大都自成一体,与主流 IPE 学者交流较少;^②而赞成者则认为正是国际市场的发展带来了环境问题,从而导致需要国际政治力量来应对它的挑战,因此,从根本上说,国际环境政治研究的也是市场与权力在国际层次上的互动,属于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家的发展长期被认为是一个国内政治经济问题,但是自从斯蒂芬·哈格德和丹尼·罗德里克等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开始将发展问题置于国际—国内互动的背景之下,考察国际因素——无论是国际政治因素还是国际市场因素——如何在单个和多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这是一种典型的“颠倒的第二意向”的研究路径。这样,发展问题也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不仅如此,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也会关注国家的发展如何影响了国际体系,主要集中于国家的兴衰与国际秩序演变的相关问题。由于发展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在国内,因此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有着亲缘关系。^③

① 代表如于宏源《国际制度和中国气候变化软能力建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8期,第16—23页;于宏源《国际环境合作中的集体行动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5期,第43—50页;于宏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中国政策协调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0期,第64—69页。其他的重要研究参见崔大鹏《国际气候合作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② 当然也有例外,有学者提出了关于“碳本位货币”的设想和研究,将环境与 IPE 三大经典议题之一的金融问题联系到了一起,感谢匿名评审人提醒笔者注意这篇文献。参见王颖、管清友:《碳货币本位设想:基于全新的体系建构》,《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2期,第69—78页。

③ 对两者的关系,参见朱天飏《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3期,第44—49页。

在发展的国际经济政治经济学领域，黄琪轩集中研究了国际安全竞争压力下的技术升级问题。“二战”以后，新的国际约束使大国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远离了战争而转向技术竞争。他通过研究发现，当世界政治出现权力转移的时候，领导国与挑战国的威胁感知会上升，双方会大幅度增加政府对研发的资助和高新技术的采购；此时，政府对技术的精度要求比较高，对研发的资助也比较集中，也更容易突破以往的技术瓶颈。因此，他认为大国间的权力转移极大地推动了重大技术变革。^①

相对而言，中国学者应该更加关注中国与国际经济体系的互动。王正毅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一直致力于在国际体系的背景下研究中国的发展和转型问题，并产生了重要的成果，^②只是在此后更加突出中国 IPE 的学科建设；苏长和也坚持将中国放在国际化的背景下探讨其内政外交转型的原因；^③而陈志敏和华裔学者崔大伟联合组织的一项集体研究也全面触及全球化力量如何推动了中国的制度变迁与结构转型。^④但总体而言，在中国如何参与国际经济体系，以及国际经济体系如何改变了中国的问题上，中国 IPE 学者显然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多值得进一步努力的空间。^⑤

① 黄琪轩《大国权力转移与自主创新》，《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研究》2009 年第 3 期，第 65—70 页；黄琪轩《大国政治与技术进步》，《国际论坛》2009 年第 2 期，第 59—63 页。

② 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王正毅《理解中国转型：国家战略目标、制度调整与国际力量》，《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 6 期，第 7—14 页。

③ 苏长和《发现中国新外交：多边国际制度与中国外交新思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 4 期，第 11—16 页；苏长和《国内/国际相互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兼论中国国内变迁与国际体系的关系（1978—2007）》，《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 年第 12 期，第 6—13 页。

④ 陈志敏、加 崔大伟《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全球化》，上海三联书店 2006 年版。

⑤ 国际学界在该领域已经有很多出色的作品，参见 David Zweig, *Internatinalizing China: Domestic Interests and Global Linkag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Thomas G. Moore, *China in the World Market: Chinese Industries and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Reform in the Post-Mao Er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郑永年《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郁建兴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三、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评价与思考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长期面临复杂的国际安全压力，因此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长期被“高级政治”研究所垄断，而且现实主义占据压倒性地位，经济因素被认为是处于相对次要地位。同时，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又长期被经济学界所垄断，政治因素遭到忽略。因此，中国的 IPE 一直生存在国际安全研究和经济学的双重挤压中，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

(一) 中国过去十年 IPE 发展的基本特点

在过去大约十年的时间里，IPE 在中国被逐渐认可为国际关系学下的一个分支学科，并取得了可喜的发展和进步，特别是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逐渐涌现了一些出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的、在研究生阶段就接受了相对系统的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训练的第二代 IPE 学者，他们逐渐成长为 IPE 研究的主要力量。

总体而言，中国的 IPE 研究在过去十年体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中国 IPE 学者对西方宏观范式的兴趣要低于国际安全领域，体现出以具体议题为研究导向的特征，这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过去十年盛行“主义”和“范式”研究有很大不同。特别是第二代 IPE 学者一开始就选择特定的议题而非文献梳理作为自己的研究主业，尽管他们也从事一些学术介绍性工作。这带来的一个积极后果就是，实证研究而非范式辩论成为中国 IPE 学界的主流。中国 IPE 研究的这种整体性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国际 IPE 学术发展的趋势比较吻合，从国际 IPE 作品来看，很少是纯粹进行一般性理论构建的著作，大多是在具体议题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修正与扩展。^①这也导致流派的归属在第二代 IPE 学

^① 白云真在与笔者的通信中表达了与笔者同样的观察。

者中已经比较淡化。

第二，研究议题高度集中，并受国际现实变化的驱动。由于中国 IPE 研究队伍本来就规模不大，且研究议题相对集中，才使中国的 IPE 研究能在过去十年产生一些可见的学术成果。同时，中国的 IPE 研究受现实变化的影响较大。中国学者比较集中关注的几个研究议题，如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与中美贸易和金融关系、东亚经济合作、主权财富基金、国际能源与环境政治等热门问题，都是受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现实发展所驱使的，而较少受西方既有研究课题（research topic）的影响。

第三，中国的 IPE 理论研究由早期学术源头的多元性向美国主流 IPE 全面靠拢。在理论贫穷的中国，以西方既有的理论成果作为分析框架，进行新的案例检验，这是中国早期乃至当下 IPE 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主要路径。早期 IPE 学者对西方理论的运用显得比较多元，比如王正毅对世界体系论的运用，李滨对考克斯理论的运用，耿协峰对斯特兰奇权力结构理论的运用等等，但是进入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特别是中后期之后，呈现新一代的 IPE 学者向深受新古典经济学影响的 IPE 美国主流学派靠拢，而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和英国学派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在中国 IPE 界逐渐减少的趋势。

第四，中国 IPE 界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中国经济学界中一部分关注现实问题的中青年学者，开始强烈地意识到传统的经济学分析已经不能满足理解很多国际经济现象的需求，承认政治力量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他们虽然接受的是西方经济学的训练，但致力于将政治因素“找回来”，有意识地从 IPE 的路径分析国际经济问题，从而在事实上加入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队伍，其代表人物是张宇燕、盛斌、李晓、何帆、管清友等。但由于传统学科的分离，以及学术交流平台的不足，经济学家与国际关系学者的学术互动仍需要进一步加强。

（二）中国 IPE 发展的缺陷与不足

总体而言，在中国全面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的最近十年里，中国国际关

系学界出现了一个重大的悖论,即一方面遭遇了很多值得研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却相对不足。中国 IPE 与西方特别是美国 IPE 研究水平的差距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这种差距具体表现在:

第一,中国 IPE 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并没有完全形成,中国的 IPE 学者还没有形成共同的身份认同,彼此的学术交流比较有限。在长达 10 年的时间里,中国学界并没有召开一次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题会议。根据笔者的基本统计,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已经形成了一个 20—30 人的相对稳定的 IPE 核心学术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与传统的国际安全研究形成了不同的风格。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主要有两个学术组织——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和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都定期举行学术活动,但这两个学术团体却并没有举行一次关于 IPE 的分论坛。除了国际关系学内部的 IPE 研究人员之间相互交流比较少外,经济学界的 IPE 研究者与国际关系学界的同行交流更少。中国的 IPE 学界迫切需要搭建与经济学者交流的平台。

学术期刊是形成学术共同体的主要载体,中国缺乏专门以国际政治经济学为主体的专业期刊,比较之下,美国有《国际组织》(IO)、英国有《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美国主流 IPE 都是以《国际组织》为最核心学术交流平台的,进而形成了影响巨大的“IO 学派”。^①令人鼓舞的是,《世界经济与政治》和《当代亚太》正逐渐发表越来越多的 IPE 作品,有可能成为中国 IPE 学术成果交流的主要园地。不仅如此,《世界经济与政治》在 2010 年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联合发起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年度论坛,吸引了国内大部分 IPE 专业学者以及对政治力量感兴趣的经济学者的参与,这标志着中国 IPE 学术共同体开始逐渐形成。^②

第二,研究队伍总体薄弱,研究议题存在严重失衡现象。强大的学术

① 参见李巍《国际政治经济学演进的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 年第 10 期,第 68—80 页。

② 第一届论坛于 2010 年 10 月在中国社科院召开,第二届论坛于 2011 年 11 月在国际关系学院召开,第三届论坛将于 2012 年在上海举办。

研究实力虽然不必一定要求庞大的人员规模，但在中国，IPE 学者队伍与国际安全研究规模过于不成比例。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队伍可谓已经庞大，但是能够进行专业 IPE 研究的学者队伍如今仍然非常薄弱，不少学者对 IPE 的理解依然停留在“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的简单综合”的阶段。而根据一项调查统计，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有 30% 的学者认为他们最重要或者第二重要的研究领域是 IPE，^① 这一比例显然令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难以望其项背。根据笔者的统计调查，在中国，持续进行了超过 10 年以上专业 IPE 研究的学者可谓屈指可数；进行了 5—10 年的 IPE 研究、兴趣没有发生过转移的学者也不超过 10 位；大部分是近三五年刚刚入行的新手，而且他们的研究兴趣还不稳定，是否会持续且在 IPE 领域扎根，还未可知。^②

在研究议题上，在有些领域学者们出现扎堆研究的情况，而在另一些领域，却缺乏中国 IPE 学者的参与，甚至存在空白现象。以国别而论，中国 IPE 学者关注美国过多，这虽然与美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地位有关，对中国影响巨大，但过于集中于美国，忽略其他国家甚至包括中国自身的经验，并不利于中国 IPE 的成长；以议题而论，中国 IPE 学者主要集中在贸易政治领域，最近几年，在能源和环境问题上开始跟上，但对金融政治特别是跨国投资和国际发展问题关注不够，缺乏相应的力作。

第三，研究方法比较单一。IPE 的研究方法可分为两大类：其一，历史和哲学的规范性研究方法；其二，科学实证研究方法。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需要大量经济学的知识和方法作为基础，进而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学比国际关系的其他领域更强调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20 世纪 90 年代，作为科学方法的实证主义研究几乎完全统治了美国主流的 IPE 研究，它强调运

^① Daniel Maliniak and Michael J. Tierney, "The American School of IP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6, No. 1, 2009, p. 10.

^② 形势更为严峻的是，除了北大、复旦和人大等少数高校之外，其他高校能开出专业 IPE 课程的师资力量仍比较有限，尽管已略有改观。不仅如此，在中国能够指导 IPE 方向博士生的导师队伍也很弱小，这进一步制约了学术后继力量的发展。

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释社会世界。^① 这对方法论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了，而在实证方法中，定量研究在过去十多年非常迅速地成为西方 IPE 最主流的分析工具。这是因为，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一些数据相对容易获得，运用统计方法能够使研究结论更加精确。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到 2006 年 90% 的 IPE 的学术文章利用了定量研究的工具。^② 中国大部分 IPE 学者一开始都确实走上了科学实证研究之路，但是大部分都是定性研究，对经济学中比较普遍的定量分析工具使用较少，能进行形式建模 (formal modeling) 的研究作品就更加匮乏，即便是在新一代的 IPE 博士生中，这种情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观。大多数学者都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显得比较单一。^③ 定量研究方法的缺乏，正制约着中国 IPE 的发展及其与国际同行进行对话的能力。^④

第四，对西方学术前沿的追踪不够。在国际关系学内部，中国有一支数量庞大的理论引进和前沿追踪的学术队伍，并结出丰硕的成果。但具体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对国际学术前沿的追踪显得不足，远远落后于国

① 对国际关系研究中实证主义方法的探讨，可参见 Steve Smith, Ken Booth,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中国学者的阐述可以参见李少军《国际关系研究的实证方法：现状与争论》，载王逸舟主编《国际政治理论与战略前沿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 1—28 页。

② 相比而言，在整个国际关系学的文献中，使用定量方法的不超过 43%。在过去 15 年的时间里，定量研究方法在美国 IPE 中全面兴起，2000 年以后毕业的 IPE 博士生中，有 36% 认为定量是他们的主要研究方法；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这一比例是 27%；80 年代或者更早，这一比例是少于 18%，参见 Daniel Maliniak and Michael J. Tierney, “The American School of IP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6, No. 1, 2009, pp. 20, 22。也有中国学者指出了这一点，参见曲博《因果机制与过程追踪法》，《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 4 期，第 98 页。

③ 很多美国学者都倡导要加强对研究生的定量研究能力的训练，参见 Henry Farrell and Martha Finnemore, “Ontology, methodology, and causation in the Americ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6, No. 1, 2009, pp. 58 – 71; Kathleen R McNamara, “Of intellectual monocultures and the study of IP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6, No. 1, 2009, pp. 72 – 84。相比之下，王勇教授、田野副教授与白云真博士在与笔者的通信中都强调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对于中国 IPE 发展的重要性，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无优劣和高下之分。

④ 值得一提的是，2008 年 12 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共同举办了“中国崛起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提交的论文几乎全部都使用定量研究方法，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际安全领域的翻译和引进速度，不仅 90 年代以来的一些主要著作没有引进过来，而且七八十年代的一些经典作品也没有翻译。同时，中国国际关系专业目前使用的 IPE 教科书对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范式辩论介绍比较充分，但是对 90 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的最新进展却介绍相对不足。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仍然需要对西方学术前沿进行有价值的综述，以缩小与学术前沿的距离。

（三）中国 IPE 未来的发展方向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学界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大反思，传统国际关系学者被认为正在“被边缘化”，^①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IPE 和非传统安全研究在中国长期势单力薄。这场“学科的危机”将有可能推动在未来十年中国 IPE 研究高潮的到来。

与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一样，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未来发展，仍然将会受国际经济关系中不断出现的重大现实性问题的驱动，具体而言，它可能会产生三个重大的方向。

第一，中国崛起与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中国崛起日益构成全球国际关系学界的一个重大研究问题，中国传统的国际关系学者和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不断给出自己的新回答，^② 但中国 IPE 学界却少有参与本国对外经济关系和发展模式的讨论，也跟不上冷战后国际经济体系的变化所提出的新问题。比如，中国入世之后所带来的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但缺乏相关力作。未来十年，中国 IPE 的很多成果将更多地围绕中国崛起进程中的对外经济关系来展开，比如中国的 FTA 战略、人民币的国际化、中国海外投资及其保护、中国的能源安全等

^① 关于这场讨论的部分内容可以参见王文《中国国际关系学面临三大危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年 5 月 6 日，第 15 版；李巍《国际关系学走向终结》，《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年 3 月 25 日，第 15 版。

^② 代表性著作如孙学峰《中国崛起困境：理论思考与战略选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朱锋、罗伯特·罗斯主编《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等, 这些议题目前在中国都完全被经济学界所垄断, 但经济学的学科性质使其难以肩负起全面回答上述问题的重任。

特别是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展模式的特殊性, 中国 IPE 学者需要进行深入总结, 它将构成整个中国 IPE 在未来发展的一个根本性的宏观背景。^① 查道炯就认为, 犹如美国 IPE 兴起的一个背景就是美国衰落一样, 中国崛起过程中的“脆弱性”应该被当做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背景, 在这个背景意识的基础上, 中国专业 IPE 研究和教学的共同体有必要通过细化选题, 更多地从专题研究入手, 越来越有针对性地为参与世界提供智力支持, 这有利于在中外 IPE 研究界对话的过程中扩大中国学者自己的话语空间。^②

总之, 正如有的中国学者所呼吁的那样, 中国 IPE 当下的研究, “应该可以把更多的目光投放在基于中国自身的研究上, 实现从‘中国学者对 IPE 的研究’到‘IPE 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以及‘在中国的 IPE 研究’到‘基于中国的 IPE 研究’的双重转变”。^③

第二, 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治理与地区合作。2008 年金融危机是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后危机时代, 全球化与地区化的矛盾在未来若干年仍将继续存在。在全球层面, 如何加强全球治理, 特别是环境治理、金融治理以及对国际发展鸿沟的克服, 都将成为中国 IPE 发展的重点领域, 具体而言, 国际金融机构 (主要是 IMF 和世界银行) 的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机制、国际发展援助等议题, 将会吸引越来越多中国学者的关注。

而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的久拖不决以及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刺激和国际金融机构的低效, 将继续推动地区合作的发展。面对全球治理的失灵, 地缘

① 该领域的尝试性探讨, 参见黄琪轩《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发展》,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 年第 1 期, 第 25—45 页。

② 查道炯《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中外关系研究: 背景意识问题》, 《国际政治研究》2006 年第 2 期, 第 40—49 页。

③ 宋国友《基于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问题领域、理论突破和学科弥合》,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 年第 1 期, 第 62—63 页。

上毗邻的国家将会进一步采取各具特色的区域治理模式来克服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或者是在区域层面推进自由化。对中国而言，东亚经济合作的进展与曲折将继续是中国学者关注的焦点；同时，在中国，仍有强大的学术资源集中关注欧洲一体化的经验，特别是由本次希腊债务危机之后引发的欧元未来发展趋势，值得中国 IPE 学者密切关注。

第三，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和性质。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国仍将是世界的经济霸主特别是金融霸主。美国对国际经济体系的操控能力仍然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特别是美元霸权并没有因为这次金融危机而发生实质性动摇。但从长远看，由于国际社会越来越意识到美元霸权对国际经济体系构成的威胁，反美元霸权的力量将会进一步兴起。因此，美国经济霸权的走向及其政策护持行为在中国 IPE 研究中，将会持续成为一个学术“富矿”，特别是中美经济关系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仍然继续会是中国 IPE 研究的核心议题。

总之，在全球化发展和中国经济崛起并融入世界这两个大背景之下，IPE 在中国将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研究领域，但如何克服各种障碍，推动中国 IPE 研究的发展和繁荣，中国学者还任重而道远。

作者简介

钟臻 香港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 cookiechung@163.com

吴文兵 贵州财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2011年在清华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国际安全、国际政治经济学。

电子信箱: wuwenbingthu@sina.com

漆海霞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讲师。2007年在清华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电子信箱: oceanqi@126.com

徐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2006年在清华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国际安全、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以及战争法。

电子信箱: xuj@cass.org.cn

唐世平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1995年在美国韦恩州立大学 (Wayne State University) 获分子生物及遗传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政治理论、社会科学哲学以及制度经济学等。

电子信箱: twukong@yahoo.com

王明国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讲师。2012年在复旦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电子信箱: wmg7971@sina.com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2009年在复旦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2009—2011年在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金融改革。

电子信箱: kindyleeway@gmail.com